

对人身保险合同受益权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兼论受益权的行使、保护与限制

李 利¹ 许崇苗²

(1.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033)

【摘 要】 人身保险合同受益权问题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涉及一个国家保险法立法体系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框架。我国《保险法》涉及受益权的条文比较多,但仍存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通过并于12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三》”) 对受益权问题也用不少的条文进行了解释,但笔者认为仍有不少问题未彻底解决甚至引发更多争议。究其原因,在于对受益权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本文在合理界定受益权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受益人和受益权制度的适用范围和理论基础,并结合各个国家保险法立法体系的差异和学者不同的学术主张,对受益权的性质、受益权的产生、变动和行使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在我国如何对受益权进行优先保护与限制等,以期完善我国《保险法》对制定受益权的司法解释提供理论支持,并对与受益权有关的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提供指导。

【关键词】 保险法; 保险合同; 受益权

【中图分类号】 D922.2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306(2016)07-0111-11

DOI: 10.13497/j.cnki.is.2016.07.011

一、问题的提出

人身保险合同的主体比一般民事合同要复杂的多,除合同当事人即保险人与投保人外,还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导致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和履行等具有复杂性,需要很好地厘清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主要是指各种主体之间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之间的划分。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来说,正确理解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并合理界定受益权的内涵与外延,是保险人正确履行人身保险合同的基础。在当前的保险实践中,商业财产保险中也会约定受益人,又涉及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适用范围和法律适用问题。

(一) 受益权的界定

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和受益权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因死亡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无法领取死亡保险金,为尊重其对自己死亡保险金请求权的处置意愿而特别创设的法律制度。我国《保险法》虽然未对受益权进行直接的界定,但对受益人进行了定义。与民法和其他法律中的受益人不同,人身保险

【作者简介】 李 利,法学硕士、律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教授;许崇苗:法学博士,律师、中国注册会计师(CPA),现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与合规部总经理以及公司法律责任人,复旦大学和对外贸易大学等法学院兼职实务导师,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和保险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本文中涉及台湾的“国家”均应为“国家(地区)”、“各国”均应为“各国(地区)”。

合同的受益人有其特定的含义,是专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受益权的概念与受益人密切相关,是指受益人依法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该权利的来源是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权的让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受益人所取得的权利仅以保险金请求权为限,其他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权利,如保险合同变更和解除权、保险费返还请求权、保险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人身保险单质押借款权和取得红利的权利等,除合同另有约定,原则上应属于投保人享有,而不是由受益人享有,不属于受益权的范畴。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6条第1款规定“保险合同解除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为不同主体,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要求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对于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我国《保险法》规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对于该权利人是否包括受益人,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并不清晰。《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6条第2款对此进行了规定“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保险人依照保险法第四十三条规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其他权利人按照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继承人的顺序确定。”从目前的保险实践看,保险合同一般约定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或者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并不包括受益人。因此,此种情况下退还保险单现金价值的请求权不属于受益权的范畴。至于人身保险合同无效且保险公司有过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为受益权的范畴,我国《保险法》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从受益人和受益权的定义来看,人身保险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保险金请求权不是同一概念和范畴,受益人不享有该种权利,而应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享有。

(二) 受益权制度是否为人身保险特有的制度抑或适用于财产保险

对于受益人和受益权的适用范围问题,主要有狭义说、折衷说和广义说三种学术主张。狭义说主张受益人和受益权仅仅适用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折衷说主张受益人和受益权适用于所有的人身保险合同,不应限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广义说则主张受益人和受益权适用于所有的保险合同,包括财产保险合同。

按照狭义说的主张,受益人和受益权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尤其是死亡保险)是通行的观点。德国、日本的保险法学者通说均主张受益权制度是人身保险特有的制度,不适用于财产保险。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认为,因人身保险尤其是死亡保险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无法领取保险金并进行处分,建立指定受益人的制度显得非常必要。但财产保险不存在这一问题,若适用受益人和受益权制度,可能产生实际受领保险金之人并非受损害之人的结果,与《保险法》上的损失补偿原则不符。而且,享受利益者为受益人,还有可能产生赌博行为和道德风险,与财产保险之本质不合。因此,受益人和受益权制度只能适用于人身保险。江朝国先生持上述观点。但我国台湾也有学者主张受益人的概念和受益权制度同时适用于财产保险,郑玉波先生持上述观点。台湾“最高法院”1996年度台上字第2586号判决采取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的见解。但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分析,受益人和受益权是人身保险合同特有的制度,不适用于财产保险。

笔者认为,把受益人和受益权制度扩展适用于财产保险没有必要,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受益权无法实现的法律后果。因为财产保险的保险事故与人身保险迥然不同。财产保险不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保险事故,且在多数情况下,被保险人完全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再处分自己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实质是保险合同债权的转让,与受益人的指定不同。而且,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金要赔付给实际受损失之人,随着保险利益的变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被保险人并不一定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受益人的指定会因此而无效,增加了操作的难度和发生受益权纠纷的可能性。但在保险实务上,财产保险合同约定受益人也是存在的。如何解释财产保险中的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值得探讨。笔者认为,财产保险合同中约定

的受益人并非是保险法意义上的受益人,应属利他财产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或者是附条件的权利的转让,不适用保险法关于受益人和受益权制度的有关规定,其权利义务及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要适用民法和合同法等法律确定,该受益权并不具有保险法意义上优先于继承权的优先性。在被保险企业破产时,该受益人所享有的受益权与其他债权人享有的债权也是平等的,只能按照破产债权来处理。

二、对人身保险合同受益权性质的再探讨

对人身保险合同受益权的性质,国内外不少学者均进行了探讨,但仍然存在分歧,即使观点相同,但各自观点的法理基础和依据也不一样。焦点主要集中在受益权是期待权还是既得权、受益权是原始权利还是传来权利、受益权是否为传统意义上的债权、受益权是否具有优先性以及具有优先性的理论基础等。究其原因在于对各国保险法的立法体系和价值取向理解的不够系统和全面。对受益权性质的不同认识,决定了受益权产生、变动和消灭的时间、方式,受益权能否转让,受益权是否受到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抗辩的制约以及受益权与继承权和其他债权的关系等。

(一) 受益权是期待权还是既得权

期待权是和既得权相对而言的,其区分的依据是权利的成立要件是否已全部成就。一直以来,关于受益权的性质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通行的观点认为受益权不是既得权而是期待权,若权利人未放弃变更或者撤销等处分权,权利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前随时变更或者撤销其指定使受益权消灭。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这种权利才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权即债权。李玉泉、吴兆祥和叶启洲等学者持该观点。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江朝国先生则主张,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所享有的不是权利而仅仅是一种期待的地位。而秦道夫先生则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权不能继承为由,主张受益权属于一种身份权。也有国内学者主张受益权属于既得权,认为受益人自指定后就具备了权利的全部构成要件而不仅仅是一种资格或者期待地位。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受益权的性质,但均不够全面且存在一定的缺陷。受益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是期待权,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权从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理由如下:从各国保险法的规定看,受益人被指定后在保险事故发生前一般是可以变更的,受益人的变更也不以受益人的意志为转移,且受益权在转化为既得权之前因一定法律事实的出现或者具备法定条件时也会丧失。从这个角度讲,受益权不是既得权而是期待权,因其不具备既得权成立的全部要件。保险事故发生后,权利人不得再重新指定、变更受益人或者撤销受益人的指定,受益人的权利才能最终确定,从而从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也就是说,只有保险事故发生后且受益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生存的情况下,受益人才能真正取得和行使受益权。如《德国保险契约法》规定“除要保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之外,被推定为受益人的第三人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取得保险人给付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则规定受益权的行使要以受益人于请求保险金额时生存者为限。若主张受益权是既得权,无法解释权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可以变更受益人或者受益的顺序和份额等;若主张受益权仅仅是期待权,也无法解释受益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可以行使受益权取得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或者对保险金请求权进行转让。受益权是否丧失与能否转让均与受益权的性质有关。基于受益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是一种期待权,在转化为既得权之前会因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导致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如权利人撤销受益权或者变更受益人、受益人放弃受益权、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等,具有不确定性,各国保险立法一般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是不能进行转让的,但经权利人同意或者保险合同载明允许转让的不在此限。在保险合同允许受益权转让,或者受益人在征得权利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受益权的转让,从实质上来说,是受益人的变更而不是受益权的转让。具体来说,若保险合同中载明受益权允许转让,是被保险人把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授予受益人来行使;受益人在征得权利人同意的前提下转让受益权,实质是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

(二) 受益权是固有(原始)权利还是传来(继受)权利

一般通行的观点主张受益权是固有权利,即受益人依据其身份从人身保险合同直接取得的原始权利,非继受取得。我国台湾著名保险法学者刘宗荣先生和沙银华先生持上述观点。因此,在被保险人负有债务的情况下,若有指定的受益人,保险金不能作为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来继承,也不能用以抵偿被保险人生前的债务,其理论基础是受益人为利他人身保险合同的第三人。

笔者认为,要探讨受益权到底是固有权利还是传来权利,首先要弄清楚受益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亦即受益人是否为人身保险合同中的第三人。而对于受益人法律地位的确定,取决于各国保险法不同的立法体系和不同的规定。从世界各国的保险立法分析,受益人在人身保险合同尤其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是不可或缺的,分为法定受益人和指定受益人两种。但不同国家的保险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有的侧重保护投保人的利益,有的侧重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从指定受益人的权利人和受益人缺失的情况下受益人的推定就可以得到证实。如《韩国商法》规定“保险合同人有权指定或者变更保险受益人,若保险合同人未行使前述权利而死亡或者指定的受益人在保险存续期间死亡,则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继承人为受益人”。《日本商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保险金额受领人为第三人时,该第三人当然享受保险契约利益,但是投保人有另外意思表示时,不在此限。若指定的受益人死亡且投保人未重新指定新的受益人而死亡,保险金额受领人的继承人即成为保险金额受领人”。从这两个国家的保险立法看,指定受益人的权利人为投保人,且法律并未确定被保险人是保险金请求权人,在实质上受益人才是保险金请求权人。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是依据指定或者推定获得受益人身份直接取得的原始权利,而不是继受权利,因受益人在理论上为利他人身保险合同的第三人,该第三人依据合同直接取得合同权利。在美国,人身保险合同具有信托的性质,受益人取得的保险金请求权也为固有权利。但我国《保险法》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的规定与上述国家保险法的规定存在根本的区别,即法律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被保险人不但以其寿命和身体作为保险标的,又同时作为利他人身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受益人并不是利他人身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其仅仅是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也就是说,在我国和台湾地区保险法项下,被保险人作为利他人身保险合同的第三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是原始权利,受益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是通过指定继受而来,属于传来权利。因此,受益权是属于原始权利还是继受权利不能一概而论,取决于各个国家保险法规定的不同。区分受益人的权利是原始权利还是继受权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若受益人享有的权利为依据法律或者合同的约定原始取得,并非是从被保险人那里继受而来,则该权利具有独立性,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抗辩不能适用于受益人,保险人只能依据法律或者合同约定的抗辩事由对抗受益人;若受益权为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请求权转移而来,则该权利要受到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权的制约,即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权的抗辩对受益人亦有效。从保险法立法技术的角度分析,若受益权是传来权利,则保险法仅需着重规定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即可。

(三) 受益权优先于普通债权和继承权的理论基础

如前所述,受益权的实质是被保险人让与的保险金请求权,不是人身权而是财产权,与传统意义上的债权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虽然因其在保险事故发生前为期待权不得转让,但因保险事故发生转化为既得权后是可以转让的。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但对于受益权对普通债权和继承权所具有的优先受偿性,国内外学者多以受益权为固有权利为其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该观点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从根本上揭示受益权优先受偿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其法律规定的不同,从而导致受益权的

法律性质不同。若受益权为固有权利,其与依据继承的法律事实从被保险人继承遗产的继承权的区别自不待言。但依据我国和台湾地区保险法的规定,受益权和继承权一样,应为传来权利,无法解释人身保险合同在受益人享有受益权的情况下,保险金不能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即受益权优先于继承权。笔者认为,受益权所具有的优先性固然像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是基于受益权是原始权利的缘故,但在我国则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从学理上分析,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金给付的条件已经成就,保险人由此产生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实际上,在被保险人死亡之时,受益人的受益权已经从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即受益权的条件已经全部成就,受益人具备了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全部要件。但与此同时,基于被保险人死亡的事实,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也可以根据继承权要求继承被保险人的遗产。也就是说,在被保险人死亡时,受益权和继承权行使的全部要件均具备。我国《保险法》赋予受益权具有优先性,体现了尊重被保险人意愿和优先保护受益权的价值取向。因为被保险人指定了受益人且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没有变更,其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想把保险金给受益人,而不是作为遗产由其继承人来继承。进一步分析,若受益人是继承人当中的一个,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与遗嘱继承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若受益人不是继承人,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与遗赠类似。

三、受益权产生与变动中的有关法学理论问题与实践

(一) 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人

各国保险立法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保护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有的国家的保险立法以投保人为中心主义,侧重保护投保人的利益;有的国家的保险立法以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为中心主义,侧重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从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人,以及受益人缺失情况下受益人的推定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向谁支付保险金,可以证明上述观点。如《韩国商法》和《日本商法典》均规定投保人有权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而不是由被保险人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若保险受益人在保险存续期间死亡,且投保人未重新指定受益人而死亡,则保险受益人的继承人为保险受益人。在美国,投保人是为指定受益人设定生命保险项下的资产,信托在指定受益人的名义下,在指定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下,该项保险金受益权就失去效力,投保人基于对回归到自己名下的信托财产具有处分权,可以重新指定新的保险金受领人,若投保人未重新指定而死亡,保险金的请求权作为投保人的遗产,由投保人的继承人继承。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指定受益人的权利人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也规定指定受益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人为投保人。但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与上述国家不同,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因此,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人应为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投保人实质上只有提出建议的权利,因为投保人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否则,人民法院应认定指定或者变更行为无效。

(二) 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时间

如前所述,受益权的性质为期待权,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尚不具备权利成就的全部要件,保险事故发生之时受益权由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受益人才具备了行使受益权的全部要件。因此,受益人的指定或者变更须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进行。保险事故一旦发生,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人则不能再行使重新指定、变更或者撤销受益人的权利。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作出了接受的意思表示的,不得撤回。另外,受益人变更权的行使,一般仅限于没有权利人表示放弃处分权的情形,才可以契约或者遗嘱的方式来行使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若权利人在指定受益人时就已经声明抛弃处分权的,则不得变更已指定的受益人。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有这样的规定。有的国家的保险立法还规定,若受益人向投保人表达了接受的意思表示后,投保人通过书面形式放弃撤回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具体来说,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行使

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权限,于在合同订立时或者合同订立后成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这一期间。一般来说,在指定或者变更死亡保险金的受益人的场合,保险事故的认定比较简单。但从理论上来说,生存保险金也可以指定受益人。但若指定生存保险金的受益人,保险事故的确定和受益人的变更就变得比较复杂。如在养老金中,保险合同一般约定被保险人生存至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可以选择如下任一方式领取养老年金:(1)一次性领取养老年金后保险合同终止;(2)按年或按月领取养老年金直至身故,保险合同终止;(3)按年或按月领取养老年金,但保险公司保证给付10年。如果被保险人自开始领取养老年金之日起不满10年身故,其受益人可继续领取未满10年部分的养老年金后保险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自开始领取养老年金之日起满10年后仍生存,可继续领取养老年金直至身故。对于上述第1项保险责任,保险事故的发生为一次,即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权利人可以在被保险人生存至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前变更指定的受益人。对于第2项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已经生存至保险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受益人也已经领取了几次年金,被保险人仍有权变更受益人,理由如下:虽然受益人已经开始领取年金,但该项保险责任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也就是说,受益人领取几次年金后,若要领取以后的年金,还要依赖于被保险人生存到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合同每年或每月的生效对应日。对于第3项保险责任,即被保险人已经生存至保险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受益人也已经领取了几次年金,但未领满10年,对10年以后的年金变更受益人,应该是没有争议的,理由同上。对于10年以内未领满的年金是否可以变更受益人,值得探讨。因为一旦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不管其是否能够生存10年,保险公司必须给付10年固定年金。从这个角度讲,10年固定年金保险事故的发生为一次,受益人领取10年固定年金的受益权在被保险人生存至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即已转化为既得权。因此,领取10年固定年金的受益人是不能变更的,但可以变更10年固定年金以后的受益人。

(三) 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方式与方法

1. 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方式

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权利属于形成权,即依照权利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权利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权利,效力的产生不需要另一方作出某种辅助行为或共同行为。对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作出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主要有“作出主义”和“到达主义”两种观点。从我国目前有关形成权的法律规定来看,形成权的行使一般采用“到达主义”。但《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对于变更受益人采用了作出主义,即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变更受益人应自其作出意思表示时生效: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当事人主张变更行为自变更意思表示发出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权利人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无须征得受益人明示接受、同意或者保险人的同意,即使受益人拒绝被指定,受益人的指定仍为有效,但受益人对生效的受益权可以放弃。受益人的指定或者变更也不以通知保险人和保险人在保险单批注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附贴为生效要件。若保险人未在保险单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受益人的指定或变更仍对保险人发生法律效力,保险人不能以其未批注或者附贴批单为由,否认指定或变更的效力,也不能以其未批注为由对变更后的受益人进行抗辩并拒绝向其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但无论是受益人指定、变更还是撤销,通知保险人是有必要的,因为受益权的行使需要保险人履行保险金给付义务来实现。对于通知是否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各国法律的规定不一。日本采取口头生效主义,我国以及台湾地区“保险法”则采取书面生效主义。受益人的指定或者变更虽然不以通知保险人为生效要件,但不通知保险人会产生不能对抗保险人的法律效力。所谓不能对抗保险人,是指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并书面通知保险人的受益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并可以拒绝向以遗嘱或其他合同等方式指定或者变更但没有书面通知保险人的受益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并不产

生违约责任。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和《日本商法典》对变更受益人不通知保险人产生不能对抗保险人的效力,均有明确的规定。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0条第2款对此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未通知保险人,保险人主张变更对其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受益人指定后,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又将保险金赠与他人或以之偿还债务性质,学者们的意见不一。笔者认为,由于受益人的受益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是允许变更的,且变更权属于形成权,无须保险人同意,因此将保险金赠与他人或以之偿还债务在法律上可视为对受益人的变更。

2. 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的方法和受益权的确定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受益人有数人的,需要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若指定受益人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对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数人为受益人,部分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死亡、放弃受益权或者依法丧失受益权的,该受益人应得的受益份额如何处理作出了规定,即首先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该受益人应得的受益份额则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未约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的,由其他受益人平均享有;(2)未约定受益顺序但约定受益份额的,由其他受益人按照相应比例享有;(3)约定受益顺序但未约定受益份额的,由同顺序的其他受益人平均享有;同一顺序没有其他受益人的,由后一顺序的受益人平均享有;(4)约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的,由同顺序的其他受益人按照相应比例享有;同一顺序没有其他受益人的,由后一顺序的受益人按照相应比例享有。但笔者认为,在既约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的情况下,该受益人的受益份额,不应由同顺序的其他受益人按照相应比例享有,而应由后一顺序的受益人按照相应比例享有。若没有后顺序的受益人,该受益人的受益份额应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因为在仅确定受益顺序但未确定受益份额的情况下,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是受益顺序,同一顺序的受益人对保险金是共同共有。因此,只要顺序在前的受益人存在,受益顺序在后的受益人就不能享有受益权。但若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既确定了受益顺序,也确定了受益份额,同一顺序的各受益人对保险金是按份共有,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侧重受益份额。

对于受益人的指定应包括哪些要素以及如何记载,各国保险立法的规定不尽相同。日本保险法律规定应记载受益人的姓名;我国和韩国保险法律则规定除了姓名或者名称外,还要记载受益人的地址;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则规定应载明受益人姓名及与被保险人的关系或确定受益人的方法。从各国保险法律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受益人指定的方法主要是指出受益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或者是确定受益人的方法,如通过指明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关系的办法来确定受益人。但无论采取哪种方法来指定受益人,都需要受益人的指定能反映权利人的真实意思且受益人是确定的,否则,会给受益人的认定造成困难。如果通过指明与受益人的关系来确定受益人,鉴于与受益人的关系是可变的,为避免出现纠纷,最好确定是指定时的关系还是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关系。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存在争议时作出了如下规定,即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之外另有约定外,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受益人约定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的,以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2)受益人仅约定为身份关系,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主体的,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的,根据保险合同成立时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确定受益人;(3)受益人的约定包括姓名和身份关系,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份关系发生变化的,认定为未指定受益人。笔者认为,《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指定的受益人为“法定”,因我国保险法没有法定受益人的概念,且“法定”一词不是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也不能将“法定”解释为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应认定为未指定,保险金应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另外,对于通过指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有特定的关系来确定受益人适用不同的规则没有法律依据,均应认定保险事故发生时与被保险人有保险单

载明的关系人为受益人。因为以与被保险人有特定的关系来确定受益人,其真实意图显然是不想把指定时已经存在的人通过指定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来确定其为受益人,而是使其身故时与其有指定关系的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如果保险合同中既指明了受益人的姓名或名称,同时也指明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在受益人与被保险人身份关系发生变化时,不应否认受益人指定的效力,仍要按照姓名或者名称来确定受益人。因为按照我国《保险法》,指定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是受益人指定的法定方式。在姓名和关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关系只起到补充或者确定姓名的作用,只要姓名对应的受益人是确定的,就应以姓名来确定受益人,而不能认定为未指定受益人。

(四) 各国保险法关于指定或者变更死亡保险金条件受益人的特别规定与差异

指定或者变更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受益人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是世界各国保险立法的普遍性规定,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控制道德风险的需要。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保险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是保险金请求权人,受益人才是保险金请求权人。被保险人若不同时是受益人,则只是以其寿命和身体作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但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与上述国家的保险立法存在比较大的差别:我国《保险法》与台湾地区“保险法”一样,均规定被保险人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但我国《保险法》与台湾地区“保险法”在受益人的指定或者变更方面还有一些区别,即我国《保险法》对于投保人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均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并不限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则没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对于投保人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尤其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受益人,要经“被保险人同意”,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保险立法的含义不尽相同: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要经被保险人同意,包含了双重含义:一是为了控制道德风险的需要;二是我国《保险法》把保险金请求权人确定为被保险人,投保人指定或者变更受益人是行使了被保险人的权利,当然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与在其他国家只是为了控制道德风险这一层含义是由明显区别的。

四、受益权的行使、保护和限制

(一) 不同国家和地区保险立法和司法对受益权保护与限制的比较和借鉴

1. 受益权的行使

受益权的行使是指受益人在受益权行使的全部要件具备后,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履行约定或者法定的义务,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实现自己的债权。从受益权的性质等进行分析,行使受益权的条件如下:一是人身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二是受益人未丧失受益权。三是保险事故发生使受益权从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四是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仍生存。具备上述条件,受益人即可履行法律和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来行使受益权取得保险金,如向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当然,受益人在受益权行使的上述要件全部具备后,也可以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来转让受益权。

2. 对受益权的保护

无论是法定产生的受益权,还是指定产生的受益权,一般来说是无偿的。对受益权的行使进行保护以体现对权利人意思表示的尊重和保障受益人基本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需要,也要对受益权的行使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从国外保险立法和我国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和受益权的设定来看,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保险立法比我国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保护力度要大:在投保人没有行使受益人指定权而死亡,被保险人即为受益人(法定受益人);若受益人依法确定后死亡,受益人的继承人即成为保险金受领人。因为被保险人作为法定受益人来领取保险金享有的受益权比继承权优先于债权,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免受债权人的追索。而根据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既作为保险标的,又作为利他人身保险合同的第三人,与其他国家的受益人的法律地位相同。在没有指定受益人、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受益权丧失的情况下,被保险人是保险金领取人或者是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保护的是被保险人或者其继承人的利益而不是受益人的利益,与上述国家相比对受益权的保护力度要弱,且无法起到免受债权人追索和避免征收遗产税的作用,需要在保险法上引进“法定受益人”的概念。各国保险法如《德国保险契约法》和《日本保险法》等,对受益权进行保护还体现在设立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介入权等,即投保人解除人身保险合同时,要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愿意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对价,投保人的解除权要受到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即成为投保人。另外,各国保险法对受益权的保护还体现在规定受益权优先于继承权,来保障受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如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24条明确规定“人寿保险之要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对于被保险人之责任准备金,有优先受偿之权”。最后,不少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很多州)的法律规定受益权一般不能受到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债权人的追索。而且,在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人或者受益人继承人的情况下,受益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也是以受益人的身份并基于受益权来行使,而不是依据继承权来行使,从而可以避免被征收遗产税,从而进一步体现法律对受益权的保护。如我国台湾地区“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6条第9款规定,约定于被保险人死亡时,给付其所指定之人寿保险金额不计入遗产总额。

3. 对受益权的限制

对受益权限制的情形主要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债务是否会影响受益权的行使和实现,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债权人是否对与保险合同有关的权利或者保险金有追索权?我国保险立法和司法解释欠缺相应的规定,但国外不少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法律中对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债务的追偿作出了一些规定,其中对被保险人的债权人的权利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值得我们借鉴。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923条(债权人和继承人的权利)规定“保险人给投保人或者受益人应付的保险金不得成为执行诉权或者强制保全诉权的标的。但是有关给付保险费、给债权人造成损害(参阅第2901条)的行为的废除及有关财产合算(参阅第741条)、费用记入和赠与的减少(参阅第555条)的规定,不在此限。”在我国台湾地区,若保险契约的要保人是债务人,指定债权人是受益人,主要有债权范围内受领保险给付说和不受债权额限制受领全部保险给付说两种主张。但目前多数法院倾向债权人作为受益人只能于债权额范围内受领保险给付。日本法院的判例认为,当投保人无力偿还债务时,投保人的债权人可以行使债权人代位权来行使投保人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另外,在日本基于生命保险合同所产生的保险合同债权,可以成为被扣押的对象。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的保险合同债权已经确定,可以进行转让和质押,同普通的财产权没有区别,保险金受益人的债权人可以根据一般民法中财产权的规定,对该债权提请扣押。有的学者也以人身保险产品已经脱离保障型商品的性质,远离保障基本生活的功能,该类商品在性质上是债务人财产的一部分,主张通过法律程序可以对其扣押,并由债权人合法取得解约权,不会对债务人的维持最低生活而产生不良的影响。但由于与生命有关的保险合同债权一般为被抚养着的生活考虑而设定的,与其他普通债权在性质上有所不同,虽然现行的法律中对生命保险的债权的扣押、处分没有明文规定加以禁止,但应当与其他普通债权的扣押或者执行有区别,目前日本的判例对该权利的行使也给与一定的限制,但对如何防止权利的滥用没有进行详尽的说明。

(二) 在我国对人身保险合同受益权的保护和限制

根据我国《保险法》和相关法律,并基于人身保险合同的性质,受益人的受益权要受到充分保护,这是对被保险人处分自己保险金请求权的尊重,也是对受益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但同时要兼顾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债权人的利益,不能使受益人制度成为投保人或

者被保险人恶意逃避债务的工具。

1. 投保人破产时受益权的保护与限制

在投保人不是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情况下,若投保人破产,其对于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权利,属其可支配资产应纳入偿债范围,作为破产财产范围处理,但保险金不属于破产财产范围;在投保人自己是被保险人同时又是受益人的情况下,若被保险人死亡,其所得的保险金额亦应列入破产财产范围。

2. 受益权的保护与人身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

人身保险产品类型的多样化,尤其是投资理财保险产品的出现,使基于人身保险合同所产生的债权与一般债权在性质上的差异不大。特别是寿险合同,如长期性的生存保险或两全保险,大多具有明显储蓄性质,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形成了保险人的责任准备金,在退保时则表现为投保人可以获得现金价值,寿险保险单具有财产属性,可以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标的。因此,在投保人无其他财产来偿还债务时,即使有指定的受益人,债权人也可以通过法院对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或者人身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予以冻结或者强制执行来实现自己的债权。但法院对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或者人身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的执行不能采取直接划拨的方式,因为保险费缴纳后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若要执行人身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前提是解除人身保险合同。包括投保人自愿解除保险合同或者在特殊情况下由法院强制解除已订立的人身保险合同。如浙江省高院《关于加强和规范对被继承人拥有的人身保险产品财产利益执行的通知》(浙高法执[2015]8号)对人身保险合同的执行问题作出了规定:投保人购买传统型、分红型、投资连接型、万能型人身保险产品、依保单约定可获得的生存保险金、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保单红利、或退保后保单的现金价值,均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财产权。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作为被执行人时,该财产权属于责任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执行。人民法院要求保险机构协助扣划保险产品退保后可得财产利益时,一般应提供投保人签署的退保申请书,但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拒绝签署退保申请书的,执行法院可以向保险机构发出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扣划保险产品退保后可得财产利益,保险机构负有协助义务。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若投保人不是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若其负有债务无法偿还,债权人一般不能要求以保险金来偿还投保人的债务。因为保险金请求权归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债权人不能要求以债务人以外的其他人的财产来偿还自己的债务。但对于带有明显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如果投保人的投保行为带有明显的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的情形,在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情形时,债权人应可以要求在所交保险费或者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范围内来偿还债务。对超过所交保险费的部分,保险人应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支付保险金。

3. 受益权的保护与被保险人的债权人对保险金的追索

无论受益权是作为固有权利还是传来权利,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的受益权已经从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即受益人的受益权已经具备了成立和行使的全部构成要件。一般来说,在有指定的受益人的情况下,受益权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而产生的原始权利或者是受益人基于指定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继受了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保险金应归受益人享有,不能用于偿还被保险人生前所欠各项债务,死亡保险金也不是被保险人的遗产,体现对受益权的优先保护。只有在未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权丧失等情况下,死亡保险金才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首先用来偿还债务,被保险人的债权人对保险金才有追索权。但在特殊情况下,即使保险合同有指定的受益人,保险金也有可能成为被保险人债权人追偿的对象。这种特定情形是指受益人的指定为无偿行为,而且确实明显有害于债权人,或虽为有偿行为但受益人明知有害于债权人的利益而同意为之,则被保险人的债权人或破产管理人可申请法院撤销受益人利益之指定。如依据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法律,投保人指定他人为受益人为无偿行为,若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得申请法院撤销受益人的指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的原理和有关规定,若债务人有无偿转让财产等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在债权范围内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受益人的指定一

般为无偿行为,可以视为无偿转让财产。因此,在投保人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人身保险的情况下,若其负有债务无法偿还,且其指定受益人明显损害债权人的债权的实现,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使保险金成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并要求以遗产来偿还债务。当然,人身保险合同尤其是具有保障性质的人身保险合同的债权与其他债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对债权人债权的保护也要进行适当限制,这是我国现行法律需要完善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美]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M].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2] 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的理论与实务[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 [3] 谢宪主编.保险判例百选[M].法律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
- [4] 许崇苗.保险法原理及疑难案例解析[M].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 [5] 贾林青主编.海商法保险法评论[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 [6] 沙银华.日本经典保险判例评释[M].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 [7] 尹田主编.保险法前沿[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
- [8] 李玉泉主编.保险法学—理论与实务[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 [9] 叶启洲.受益人概念的适用范围[C].载于《保险判例百选》(谢宪主编),法律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
- [10] 江朝国著.保险法基础理论[M].瑞兴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A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Beneficiary Right of Personal Insurance Contracts —With additional elaboration on the execution, protection and limitation of the beneficiary right

LI Li¹, XU Chongmiao²

(1.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Beijing 100033)

Abstract: The Beneficiary right is a critical theoretical issue in the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relating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essential framework of national insurance legislative system. There are multiple provisions on beneficiary rights in China's Insurance Law,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sputes. Interpretation III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suran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opted at the on September 21, 2015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terpretation III), has shown great concerns about this issue in some provisions. However, many problems remain unsettled, some even leading to controversy, due to insufficient study on the theory of beneficiary right. This article researched thoroughl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beneficiaries and beneficiary law, supported by identifying legitimately it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definitions. Concern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legislation system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experts' academic points, the beneficiary right was discussed further in its basic theories such as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changes, and fulfillment. This article presented on the question of how to restrict and prioritize the protection of beneficiary right on the basis of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e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of Insurance Law,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beneficiary right and guide on settling insurance contract disputes.

Key words: Insurance Law; insurance contract; beneficiary right

[编辑: 郝焕婷]